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Volume 1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6-1994

論一位香港學院派評論家的“實際批評” A Case Study of the Practical Criticism of a Hong Kong Scholar-Critic

Yuanqing G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rmlc_1

Recommended Citation

古遠清 (1994)。論一位香港學院派評論家的“實際批評”。《現代中文文學評論》，1，37-51。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rmlc_1/4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Volume 1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論一位香港學院派評論家的 “實際批評”

古遠清

從大學時代起，黃維樑就開始發表文章。以後出版的書，多為文學理論著作。其中《中國詩學縱橫論》所收的三篇論文：〈詩話詞話和印象式批評〉、〈王國維《人間詞話》新論〉、〈中國詩學史上的言外之意說〉，所論的均是中國以詩詞批評為主的文學批評。另一本《中國文學縱橫論》（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8月版），範圍有所擴大，不僅論詩，還兼及小說，但此書的內容和前書一樣，都偏重理論探討，而非具體作品的批評。

香港地區，理論研究與實際批評並不相互交叉，有不少學者從歐美回來專攻比較文學，或引進不少新的文學理論到台港，但他們並沒有或很少將理論研究成果用在香港當代文學批評上。也有理論與實際評論相結合的，可惜這種結合多半為中國古典或西方近現代文學作品，或大陸新時期作品。黃維樑與這些學者不完全相同。他不滿足於只研究文學理論，更希望將理論研究的成果落實在作品的批評，尤其是香港文學的批評上。“實際批評”，成了他二十多年來耕耘的另一個領域。其中《香港文學初探》和他對余光中作品的研究，是他“實際批評”這棵大樹上所結出的兩顆最為豐碩的果實。黃維樑的“實際批評”實踐再次證明：優秀的評論家絕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書獃子，他應同時聯繫創作尤其是本地區的文學創作實際，而且其重要性決不低於把握理論和闡發理論。

一位香港本土評論家的崛起

《香港文學初探》，是香港當代文學史上唯一一本以香港文學為評論對象的專

《香港文學初探》，是香港當代文學史上唯一一本以香港文學為評論對象的專著。該書出版後，在大陸及香港，有不少人寫了文章作了熱情的肯定，^①香港的《讀者良友》、《讀書人》雜誌，則發表過一組批評尖銳的文章。^②正是這一正一反的批評，使《香港文學初探》分外引人矚目。

在出版《香港文學初探》之前，黃維樑出版過《中國詩學縱橫論》、《怎樣讀新詩》、《清通與多姿——中文語法修辭論集》等論著，已引起評論界的重視。不過，黃維樑當時是作為純文學理論家而不是作為香港本土文學評論家的面貌出現在香港文壇上的。從研究方向來說，他主要研究中國詩學和語法修辭理論，極少涉足小說和通俗文學評論。在歸屬上，他主要是學院派評論家，而不是作家式的評論家——雖然他本人也兼搞創作。難能可貴的是，黃維樑從事香港文學評論時，並沒有局限在學院派作家，他評論的對象多是非學院派作家，如劉以鬯、舒巷城、黃思騁、東瑞、陶然、西西、鍾玲等。對這些作家的評論，他往往能提出與眾不同的看法（如對西西小說〈奧林匹斯〉評論）。正因為黃維樑的文學評論沒有停留在作品的層面上，彌補了就事論事批評的不足，這才引起香港作家的高度關注。他們可能因文學主張及藝術趣味的差異，對黃維樑的評論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見，但也難以否認黃維樑評論的重要性及其巨大的反響。尤其是比較起那些從事已去世的作家研究為主的評論家來說，黃維樑的評論無疑更切合他們的創作實際，更容易成為他們作品的知音。當作家們讀厭了報刊上那些廣告式的和離文學創作實際甚遠的評論之後，黃維樑的注意創新和注重藝術個性的評論，無疑給香港文壇注入一股新鮮活力。

《香港文學初探》的結集出版，宣告了一位名副其實的香港本土文學評論家的崛起——這裏說的“香港本土文學評論家”，是指長期生活在香港，以香港本地（而非以籍貫為標準）文學作品為評論對象的評論家。在黃維樑之前，也有不少人寫過香港作家作品評論，但大都顯得零碎，出集子時都沒集中在香港本地文學的評論上。這些客串的香港文學評論家，或對香港文學表示過巨大的熱情，但未能持之以恆。或則對香港文學的概念和香港作家的定義缺乏認真的探討，或不十分情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香港文學的研究上。在《香港文學初探》問世以前，較少有人像黃維樑這樣自覺追蹤香港文學的發展態勢，把自己的評論從嚴肅文學擴展到通俗文學，從小說擴展到散文、新詩乃至文學評論領域，有意識對香港文學作全方位的研討。當然，黃維樑寫作《香港文學初探》之前，由於缺乏通盤的考慮，也由於他工作太忙，

雜務太多，他不可能將重點作家作品都去評論一番，但他畢竟各個領域都涉及到了，而他也由此成爲第一個較全面地評論香港本土文學的評論家。

《香港文學初探》最值得重視的是第一輯〈通論〉部分。它顯示了作者有容乃大、兼收並蓄的寬闊文藝胸懷。長期以來，人們對香港文學缺乏共識：它到底是專指嚴肅文學，還是既指嚴肅文學，又包含通俗文學？黃維樑本身主要是從事嚴肅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搞創作也以嚴肅文學爲主，但他並沒有因此輕視通俗文學，把武俠小說、流行愛情小說排除在香港文學大門之外。他認爲雅俗應該互補。所謂通俗與高雅之分，係相對而言，而不是絕對的。誰也不能斷定，金庸的武俠小說、倪匡的科幻小說、亦舒的愛情小說，有一天不會轉化爲高雅文學。最理想的做法是，高雅文學通俗化，大眾文學精緻化。互相取長補短而不是互相拆台，互相學習而不是互相排斥，香港文學發展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寬，而不是愈走愈窄。

與大陸、台灣文學不同的是，香港作家的流動性非常大。而且由於香港是國際性商業城市，是著名的自由港，這就決定了它的作家隊伍複雜，流動性大，和政治色彩一樣多元化。黃維樑認爲，香港的作家大致有下面四種類型：一是土生土長，在本港寫作、在本港成名的；二是外地生本地長，在本港寫作、本港成名的；三是外地生外地長，本港寫作、本港成名；四是外地生外地長，在外地已開始寫作，甚至已經成名，然後旅居或定居本港，繼續寫作的。^③這樣界定香港作家範圍，便避免了狹窄的鄉土觀念與排他傾向。要研究香港文學，自然得從理清香港作家的定義做起。如果爲了強調香港文學的本土性，以出生地或居留時間的長短爲唯一取捨標準，必然會縮小香港作家隊伍，不利於香港作家之間的團結。尤其是黃維樑把在香港只生活過十年但卻留下了許多有影響作品的余光中定位爲香港作家，無疑有利於提高香港文學的素質和地位。當然，香港作家的定義不宜無限擴大。像有少數出生在香港，但受高等教育及成名均在台灣（或國外）的作家，似就不應列入香港作家範疇。而黃維樑正是這樣做的。

在各種文體批評中，黃維樑最擅長的應是詩論。但在《香港文學初探》中，有特色的文體論是第5輯〈文學批評論〉。這是鮮有人注意的領域。在這部首次較爲系統研究香港當代文學的著作中，作者中肯地評論了胡菊人《文學的視野》、余光中《分水嶺上》的文學批評成就，使我們知道香港不僅有文學創作，而且有文學理論批評，且是有水準的文學理論批評。對大陸學者評價較高的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

史》，黃維樑不僅取存疑態度，而且獨具慧眼指出司馬長風成書倉促，治學態度不嚴謹，前言不對後語之處頗多，對郁達夫的《沉淪》的讚美不倫不類等毛病。^④這些批評不是出自文人相輕，更不是惡意攻訐，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香港的文學批評，圈子批評太多，往往拉不開情面指出被評者的缺失。像黃維樑這樣對前輩作家不留情面的批評，實屬少見。當然，這三位批評家並不是香港的全部代表，還有不少著名評論家如曹聚仁、林曼叔、黃繼持、陳炳良、梁秉鈞、張曼儀、璧華、梅子等等，黃維樑來不及一一評述。好在《香港文學初探》並不是概論或文學史著作。作者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評論家評論，完全有他的自由。有人指責此書的評論面過窄，如果相對過去沒有出版過這類著作來說，此書的評論面應該是最寬的。如果用“香港當代文學概觀”的角度要求它，則評論面顯然遠遠不夠理想。但像“概觀”一類的著作，要求一個人承擔，尤其是要求業餘評論家去承擔，似不夠實事求是。應該是大家通力合作，或由香港公私學術文化機構組織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用集體的方式去完成它，才較切合實際。

有人批評《香港文學初探》是“導遊式的批評”，其中拿出的是“浮光掠影的印象式論據。”^⑤這對黃維樑並不太熟悉的香港藝術部門，如當代舞蹈團、芭蕾舞團、話劇團來說，他的評論確是浮光掠影式，他沒有去深入觸及這些團體演出的文化內容。因為他主要是文學評論家而非藝術評論家。在專業分工越來越精細的今天，要求一個人既精通小說又熟諳管弦樂，既是新詩評論家又是芭蕾舞藝術權威，未免苛求。他自己在書中就坦率地承認自己“各方面的修養也不夠，難下全面的評語。”這正說明他的謙遜。至於他自稱“觀看形形色色表演的機會不多”，卻又認為“精彩的節目總是有的”，這個判斷“是不是下得太輕率、太隨意呢？”^⑥我認為不是。因“機會不多”不等於沒有機會，比如有精彩的節目他也可能看過，只不過不像專攻藝術的評論家看得那麼多罷了。另一方面，就是沒有看過，也可能聽好友講過或在報上看過有關方面的介紹。這借助於第二手材料總還是可以的吧？何況，印象式批評，也是文學批評的一種。我國古代的詩話詞話，大都是印象式批評。它重自然感悟，輕理性分析。其長處是以少總多，以簡馭繁。尤其是當評論家評述某一階段的文學創作時，總難免用概括性的描述去取代精細的分析。如在《生氣勃勃：1982年的香港文學》中，黃維樑對各種文學現象均點到為止，沒有也無法深入展開論述，否則就不成爲概述了。《香港詩話》部分用的也是這種手法。其好處是短小精悍，輕鬆活

潑。試讀〈近十年香港文學印象記〉中的下列一段：

原甸和陳浩泉的詩，曉暢易解，間有警雋小品。羈魂早期的詩，受超現實主義影響頗深，近期則趨於明朗而生活化，甚為可喜。陳昌敏的詩，有的柔美清甜，別具韻味。鍾偉民想象奇特，似乎能艱辛而不能平易。古蒼梧清暢而耐讀，其《雨聲》、《曇花》諸作，是極佳的小品。大體而言，現代主義的晦澀詩風，只如斜陽殘留在若干作者身上，這是個好現象。^⑦

這裏對每個詩人的評語，都是建立在大量閱讀作品材料基礎上的。它看似寥寥數語，其實包藏着作者大量的伏案功夫。何況黃維樑的印象式批評並非全是初步印象，還有繼起印象。這裏講的繼起印象，比起初印象高一個層次，即作者看到的不僅是一片鬱鬱蔥蔥的森林，還察看到森林中各種花草的一片色彩。如黃維樑這樣評論梁錫華和董橋的散文：其“書卷氣之重，直追王力、梁實秋、錢鍾書諸家。梁錫華徵古證今，操縱文字如耍雜技，筆調妙趣橫生。董橋為文有英國紳士丰度，燕服高冠，儀容肅穆（偶而有些英國式幽默），結構嚴謹，為一文體家。”^⑧這種一串串晶瑩閃爍、珍珠似的語言，使人想起《四溟詩話》引《霏雪錄》對唐詩、宋詩不同風格的評價。由此也可見黃維樑的文學評論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

其實，黃維樑的香港文學評論方法多種多樣。他評余光中的詩〈苦熱〉、散文〈催魂鈴〉、倪匡的小說《無名髮》，便精分細析，非常詳盡。他還在許多地方用了廣泛聯繫、縱橫比較的方法。如評余光中的〈苦熱〉和唐朝王維的同題詩〈苦熱〉對比。評黃國彬的愛情詩，不僅用杜甫的〈月夜〉、李商隱的〈夜雨寄內〉作比，以突出〈翡冷翠的寒夜〉中所表現的夫妻恩愛之情，篤厚而溫馨，還用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和〈杏燈書〉的不同，去說明黃國彬詩意中婚前戀與婚後情之分。至於莎士比亞與艾略特等世界名家，更是他評論香港文學作品時經常選中的中外比較對象。可見，只用“導遊式”批評去概括《香港文學初探》的評論方法，未免以偏概全。

還有人為了貶低《香港文學初探》的拓荒之功，竟說“黃維樑對‘文學’二字也弄不清其定義”。^⑨一位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大陸、台灣乃至海外都有一定影響的評論家，竟連“文學”的定義都不清楚，這是可能的麼？不是弄不清楚，而是各人看法不同罷了。如批評者李華川認為：“在正統的‘文學理論’上，從來沒有認同通俗作品是

文學”。^⑩這裏講的“正統”，不知以誰的論述為依據？鄭振鐸是大家公認的文學史家，他遠在1938年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中國俗文學史》。如果通俗文學不算文學，他怎麼會去為它寫史？何況，文學的觀念是發展變化的，過去認為不入文學之林的，以後完全有可能進入文學的殿堂。現在大陸學者及不少海外學者已普遍承認通俗作品也是文學的一種。可見因別人的文學觀與自己不同，就判別人不懂文學為何物的做法，未免過於武斷。何況，作為學院派評論家的黃維樑，對通俗文學沒有偏見，能積極為其辯護，並身體力行用大量篇幅去論述它，這正是他的可貴之處。當然，他的論述也有欠嚴密之處，如把寫得好的社論、廣告均視作文學作品，就很難使人苟同。文采再好的社論也只是政論文，文字再生動的廣告也只是應用文，把它們均算作文學，雖也有前例可援，如武漢的張嘯虎就寫過一巨冊《中國政論文學史》^⑪，大陸也流行“廣告文學”一詞，但筆者畢竟不贊成這樣做。像有些人那樣把優秀的武俠小說、科幻小說從文學中開除出去，誠然不妥；把寫得好的社論也算作文學作品，也未免把文學的定義弄得過寬泛了。

在《香港文學初探》中，黃維樑有力地批駁了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沒有文學的論調，這是大家都贊同的。但認為香港不僅有文學，而且“相當繁榮”，有許多人就不贊成。其實，就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小島來說，能出現像劉以鬯這類嚴肅文學的彩筆雅筆，像梁錫華這類框框雜文的快筆健筆，像梁羽生、亦舒這類武俠、科幻、愛情小說的奇筆幻筆，確實是不簡單的事。可以說，大陸眾多城市乃至某些省區，在文學的多元化和豐富多彩方面，都難與香港並肩。當然，繁榮不等於沒有問題。相反，有些問題還很嚴重。如嚴肅文學陷入困境，文學評論空氣薄弱，就是香港文學繁榮氣象後面所隱伏的危機。不過，這個危機應該說是帶着普遍性的：不僅台灣、澳門存在，而且在大陸乃至整個華文文壇都存在着嚴肅文學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的問題。黃維樑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而是他為了駁斥香港沒有文學的謬論，而着重強調香港文學的成績罷了。

香港文學要發展繁榮，必須有文學理論批評的推動。可檢視香港文壇，文學理論遠遠落後於文學創作。香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沒有文學評論家，但這裏的評論家們多半把眼睛盯在文學史上的成名作家或島外作家身上，很少有人願意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香港本地的作家作品評論中來。因為這樣做，要冒極大的風險，常常因為人際關係問題挨罵。可黃維樑並不懼怕這些。還在求學的時代，他就“酷愛中國文

學，嗜好寫作。……喜中國文學小說戲劇部分，對現代中國文學之發展，尤其關注。深感文學批評為時下中國文壇殷切之需，頗有意從事此道。”^②在大學二年級（1967年）時，他有感於香港文學這個灰姑娘的“不幸遭遇”——作品出來後無人評論，便撰寫長文，評析長篇小說《星星、月亮、太陽》，端詳了作品中三位漂亮動人的女性。過了十一年，即他取得博士學位回港教書的第二年，他同樣有感於香港文學“但傷知音稀”，又寫了洋洋萬言的文章評論一位青年詩人的三本集子。他始終不滿足於寫些評王維國《人間詞話》那樣高深玄妙、離文學現狀甚遠的論文，或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僅僅局限在比較文學，而花了許多精力去研究香港作家作品，且在研究時不怕得罪權威大膽褒貶，並不故作高深去維護西而不化的晦澀詩風，由此有人認為黃維樑文學觀念守舊。如果按前衛觀點去衡量，黃維樑確實有點“落伍”。和不少沙田文友一樣，他“對西方日新月異的文學批評理論以及創作技巧或奇謀，從來不以枕戈待旦的姿態隨時彎腰起步求趕市集。”他“總以謹慎的態度處理萬花筒式的各類詭艷或眩麗的文學市場新擺設”。^③以詩藝的理解為例，他要求“圓融的詩，脈絡紋理，宜明晰可循。詩在豐富的想象之外，還應該有個完整的‘邏輯結構’”。^④黃維樑正是依據這種美學標準，批評一位青年詩人的作品過於晦澀，不能“起碼達到與讀者溝通的目的”。^⑤黃維樑由此遭到尖銳的批評，被人戴上“霸道的批評家”^⑥的帽子。照這位批評者看來，對青年詩人只能表彰不能批評，一批評就是“霸道”，那我們還需要文學評論幹甚麼？

當然，《香港文學初探》由於是“初探”，也難免有粗疏和不周全之處。如許多人指出的：該書詳略欠妥，比例失調。還有書名過大，也使人對其內容作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它是概論性的書，或了解香港文學的入門書。但此書為通俗文學辯護，決不是它的缺陷，而應視為該書的特色。在香港文壇，通俗文學佔了重要位置，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評論家，理應正視這一問題，表明自己的觀點和態度。至於這態度和觀點是否會得到多數人的認同，那是另一回事。其實，學術觀點只要自成一家人之言就成，又何必少數服從多數？

《香港文學初探》的成績與局限及隨之而來的爭議說明：在香港，做一個文學評論家難，做一個本土文學評論家更難。正因為難，我們更需要衆多的人來做這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去開拓香港文學研究的新局面。

爲“余學”的建立奠定基礎

余光中不僅是當代台灣詩壇著述最豐的一位學者型詩人，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少見的一位文藝奇才。他無論在詩歌、散文、文藝評論還是翻譯方面，都有不同凡響的建樹。他那不斷閃爍智慧火花，使人回腸蕩氣的作品，吸引了海峽兩岸衆多的讀者。對這顆華文文學的璀璨明珠，讚美者、崇拜者甚多，而所受到的批評之多和之尖刻，在當代中國文壇上亦不多見。

隨着1952年《舟子的悲歌》的問世，余光中的名字便開始引起台灣文壇的注意，評論、研究他的文章也開始出現，爭論亦隨後發生。從1952年梁實秋發表〈舟子的悲歌〉^①到1979年4月止，評論他的文章至少接近二百篇。^②這些文章，有不少是作家個人的印象或讀後感，還談不上系統的深入的研究。像顏元叔的〈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③、陳芳明的〈冷戰年代的歌手〉^④、游社媛的〈余光中的創作道路〉^⑤，雖然也寫得極有分量，但總的說來，他們都還沒有像黃維樑那樣用這麼多的精力關切余氏創作、追蹤余氏作品，並作出這樣高度的評價：“在這六十年裏面，論作品之豐富、思想之深廣、技巧之超卓、風格之多變、影響之深遠，余光中無疑是成就最大者之一。要選舉大詩人的話，他是一個呼聲極高的候選人。”^⑥這不是胡亂的吹捧，是建立在余光中作品實踐的基礎上，並對同時代作家進行比較的結果。況且，作者措詞有分寸，並沒有說余氏是唯一的最重要最杰出的新詩人，而是加上“之一”的限定詞，這自然使余氏當之無愧。

從黃維樑1969年以“游之夏”筆名發表〈余光中：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⑦到現在，他已發表了衆多評論、研究余光中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力圖運用比較文學及其他研究方法，從台灣地區當代文學乃至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進程中，來分析研究余光中作品的思想與藝術，探討余光中的文學道路與藝術成就，研究余光中的文藝思想與藝術風格。黃維樑的文章可分爲三類：一是作品分析，二是綜合論述，三是資料整理。

關於作品分析，主要有：〈詩：不朽之盛事——析余光中〈白玉苦瓜〉並試論詩人之成就〉^⑧、〈余光中的〈慰一位落選人〉〉^⑨、〈余光中的〈黃金城〉〉^⑩、〈辟邪的銀耳墜——讀余光中近作兩首〉^⑪、〈冷氣室內談〈苦熱〉〉^⑫、〈余光中的〈大停電〉及其他〉^⑬、〈余光中〈催魂鈴〉賞析〉^⑭、〈讀〈抱孫〉的聯想〉^⑮等。這些文章的特點是：（一）

深入挖掘了作品的主要思想內容和精神特徵。如對〈白玉苦瓜〉一詩所蘊含的母愛、受難和中國性，黃氏分析得非常透徹。對〈如果遠方有戰爭〉的反戰主題，亦把握得非常準確。(二)對余氏作品的創作手法作了精細的分析，如認為〈慰一位落選人〉所運用的是“春秋史筆，作諷諭褒貶”，顯得尖刻莊重。這種分析無疑觸到了余光中詩作中的神韻。(三)藝術淵源探索收效甚著，如認為余光中長達90行的新詩〈苦熱〉，其內容旨趣和作法上的起承轉合，與唐人王維16句的五言詩〈苦熱〉非常接近。當然，黃維樑並不是說余光中是在簡單的模擬前人，而是說余氏在師法前人的基礎上作了創造性的發展。如在分析余光中的〈催魂鈴〉時，指出余文和錢鍾書《圍城》中對電話利弊的議論頗有相似之處，“但錢氏小說涉及電話的片斷，只有三四百字，而余文長達四千言，後者的想象縱橫古今中外，別有情趣，自成格局。如果說余文和錢氏小說片斷有淵源，則余文所表現的，是幾至面目全非的‘奪胎換骨’”。(四)對余光中作品的藝術魅力，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仍以對〈催魂鈴〉的賞析為例，黃維樑對〈催魂鈴〉出入古今，奪胎換骨，思奇采麗，趣味濃郁的藝術特色作了深層的分析 and 廣博的理論求證，使讀者對〈催魂鈴〉的情文並茂處，看得更分明。對〈白玉苦瓜〉、〈敲打樂〉的分析，則處處表現了黃維樑充分細膩的感情體驗，着重於整體形象的感悟和傳達，流溢着抒瀉動人的激情。(五)不滿足於讚賞余氏作品，還有時指出余氏作品的缺陷。如指出〈苦熱〉有些字眼用得惹人討厭，對苦熱的背景交代非常失策。由此可見，有人認為黃維樑完全在說余氏作品的好話，不指出其不足，是不符合事實的。(六)具有實證還原的傾向。如果說，黃維樑的《中國詩學縱橫論》、《中國文學縱橫論》表現了思辨型批評家的識見深邃的話，那他對余光中的作品賞析，則表現了實證還原型批評家的學識廣博和論證的嚴密。如對〈如果遠方有戰爭〉、〈貼耳書〉的分析，是爲了用這兩篇詩來證實自己“六何”讀新詩的方法。這類分析是爲了建立自己“怎樣讀新詩”的理論體系，但這種體系“不是爲了滿足思辯的要求，而是爲了把所有的材料和知識統率起來，所以即使同是建立體系，在精神實質上完全不同。”^⑳在這類賞析文字中，讀者可以找到各種藝術例證，學到許多文學創作知識，掌握一些鑒賞詩文的技巧和手段。

關於綜合論述的文章，主要有：〈余光中：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㉑、〈采筆干氣象：初論余光中的山水遊記〉^㉒、〈禮贊木棉樹和控訴大烟囪——論余光中八十年代的社會詩〉^㉓、〈《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導言〉^㉔、〈余光中筆下

的屈原》^⑧等等。這些文章擺脫了單篇作品分析的框架，從寬廣的範圍對余光中的創作成就作出論述。它不是印象式評論，更不是作品內容的複述介紹，而是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像〈禮贊木棉樹和控訴大烟囱〉。雖然作者對〈控訴一枝烟囱〉、〈拜托，拜托〉、〈與李白同遊高速公路〉作了詳盡的解剖，但他的視線和觸角並沒有封閉在這些單篇作品自身，而是通過這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去抓住余光中創作的總體面貌和基本傾向。這樣在全局性的研究上就有新的突破和發展，使讀者認識到這位不以鄉土性、寫實性、社會性著稱的詩人，他仍然在關懷社會，關心政治，注重寫實，且對台灣社會的某些弊端的鍼砭、諷諭，並不比同類詩人差。還在〈詩：不朽之盛事〉一文中，黃維樑就通過〈白玉苦瓜〉一詩的微觀考察，發掘出宏觀性的新意。他認為：“三十年寫詩不輟的余光中，作品內容豐富，技巧精絕，風格多變，是五四以來極少數成就最大的詩人之一。他的散文以詩為之，博麗多姿，氣勢雄偉，最具創造性，是中國歷代散文史上璀璨的奇葩。”^⑨這部分長達一萬餘字，後收入《火浴的鳳凰》時限於篇幅未能照錄。

在〈余光中：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一文中，黃維樑宏觀着眼，微觀入手，通過〈九張床〉等代表作的剖析去論證余光中在當代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和貢獻，在余光中散文研究中無疑具有新意。本來，余光中的創作從不是一種孤立、靜止的現象。從縱的角度看，它和余光中的文藝觀、創作方法、藝術風格的繼承和變化分不開；從橫的方面看，和當時的文藝思潮、寫作背景乃至文學運動、文學論爭，均有密切的聯繫。黃維樑爲了更好地把握余光中在中國當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便選取了遠比作品更爲寬廣的時空尺度，這種做法是值得讚許的。

黃維樑近年來寫的余光中作品綜論，注意運用聯繫、比較的方法去進行研究，尤其是從中外文學比較的角度去探討這位成就巨大的作家創作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比起黃氏過去寫的單篇作品賞作，無疑有一個更爲宏觀開闊的格局。像〈采筆干氣象〉一文，對余光中的山水遊記全面、系統地作出了歷史與美學的評價。作者不僅鉤玄各篇遊記的內容和藝術特色，而且對余光中用奇思壯采，寫下山水人物名勝氣象的總體成就作出恰切的評價。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余光中作品中不那麼引人矚目的篇章，黃維樑也沒有忽略其地位和價值。至於此文資料異常完備，說明性的註腳分外豐富，“以其人之論，還治其人之文”^⑩的研究方法的運用，更是匠心獨具。

關於資料匯編，主要體現在《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中。說是“匯

編”，其實是編著。作者的論文和別的學者的論文（或書評），向我們系統地介紹了余光中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這是目前見到的研究余光中最完備的一部學術著作。④它既是編著者多年銳意窮搜的資料工作成果，過去海外研究余光中成果的大展和總結，又將推動和提高海內外研究余光中的學術水平。

《火浴的鳳凰》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余光中詩集的評論；第二部分是對余光中散文的評論；第三部分是通論及其它；第四部分是附錄，包括余光中年表、著作編譯目錄、評論及介紹余光中的文章目錄。這幾大部分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概括了余光中近30年的創作生涯，可看出海外20多年來研究余光中的大致輪廓。

選文取自台灣、香港、歐洲、美國等地區。共有論文44篇，執筆者有30餘人。編著者兼顧到余光中創作的各個方面，也注意了余光中創作道路的各個階段，如對余光中早期詩作評論的搜集，就很值得重視。文章有從宏觀上着眼的，如編著者自己撰寫的〈導言〉，便是所謂全景式的余光中創作的橫切面；更多的是從微觀研究入手的，如張健對〈蓮的聯想〉、黃國彬對〈白玉苦瓜〉的評論，是所謂特寫式的余光中創作的縱深部。有讚揚性的，有批評性的；有探討性的；也有資料性的；有像梁實秋這樣的老作家寫的評論，也不乏有像李有成這樣的年輕作者。無論出自誰手的文章，編著者都注意代表性和學術性，這就使人感到這不是一個平面的資料匯編，而給人一種立體印象。

還應肯定的是，此書入選的論文不僅精粹，而且選稿時注意突出主幹。所謂突出主幹，就是着重收那些余光中作品的評論文章，對於訪問記、回憶錄之類的文章，一律不選，只存篇目附錄於後。在研究文章中，又着重突出詩論。之所以作這種安排，是因為余光中首先是個詩人，其次才是散文家。另一方面也由於篇幅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

由於海外評論、研究余光中的文章極多，爲了不漏掉重要的評論資料又方便讀者“一卷在手，覽其概要”，編著者採用了長文節錄的辦法。節錄，就要求編選者有較高的鑒別能力，能把原作者最精彩的論述提取出來。編選者本身就是研究余光中的專家，寫過許多研究余氏著作的重要論文。節錄對他來說，是不困難的事。從書中節錄的王灝等人的文章看，編選者節錄的均是文中最有學術價值或讀者極想了解的部分，且能獨立成篇。個別篇章節錄時對原意則有損。好在編者在文後附出處，讀者如果想了解原貌，可按此線索查找。黃氏編著此書，不僅認真閱讀了原

文，準確地代原作者分節和擬小標題，而且對論文所引余光中作品，無論長短均加核對。遇有錯訛之處，悉依原作校正。少數論文中所談的事實有出入，均加訂正。尤其是後面附錄的年表，挖掘出不少鮮為人知的史料。這充分說明，這本書無論對於一般詩歌愛好者，還是台灣文學研究工作者，都是極為及時的有保存價值的書。我們十分希望能讀到編著者的新作——“余光中作品評論集”的續編。^④

綜觀黃維樑的余光中評論與研究，具有下列特色：

一是全方位評價余光中。即不僅把余光中作為一位詩人去研究，而且沒忽略余光中的散文建樹和文學理論批評的建樹。最後一點常被人忽略。台灣有一位學者寫了洋洋十餘萬言的長文〈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⑤，從“五四”至70年代有影響的評論家均有論述，惟獨缺乏對余光中評論成就的評價，這自然不是一般的遺漏，而是說明作為詩人、散文家的余光中得到了許多人的確認，作為評論家的余光中卻還沒有引起人足夠的注意。而黃維樑，是最早論述余光中作為評論家的成就的學者。^⑥

二是對余光中的詩文作出“精新鬱趣，博麗豪雄”的概括。^⑦這裏講的“新”，是指創新；“鬱”，兼指情思的沉郁和風格的鬱茂多變；“趣”，則是指幽默和趣味；“博”，指有廣博的學問以供驅遣；“麗”，指瑰麗，即余氏筆鋒剛健壯麗，文氣充沛，另方面是指余氏創造了不少清麗柔美的意境；“豪雄”，指“體勢雄渾，且有一股自豪之氣。”余光中以風格多變著稱，對他的創作風格概括實屬不易。黃維樑知難而進，通過多扇窗戶去窺探余氏形成藝術風格的奧秘，去概括余光中感情抒發的方式、想象展開的特點以及形象描繪、語言使用等方面的特色。黃維樑對余氏風格的研究深深紮根在中國古典文論的土壤裏，和鍾嶸、劉勰、司空圖的綿長傳統根鬚相連。

三是對有爭議的問題作出了自己的獨立判斷。余光中的〈敲打樂〉有如下句子：

……

敲打樂巴布·狄倫的旋律中側向金斯堡和費靈格蒂

從威奇塔到柏克麗

降下艾略特

升起惠特曼，九繆思，嫁給舊金山！

在鄉土文學論戰中，陳鼓應曾寫有〈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⑧一文，認為余光中狂熱迷戀美國，竟忘了自己是那一國人，“他的‘靈魂’早已‘嫁給舊金山’了。”黃維樑

反駁了這種解釋，認為余詩所寫的“九繆思，嫁給舊金山”，指的是“美國詩壇的事。余光中並沒有嫁給舊金山，因為他對中國的感情太深厚太濃烈。他與中國連在一起，中國使他不快樂，也使他快樂。〈敲打樂〉中他這樣說：‘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中國是我我是中國。’”^④這種分析，避免了搞句的片面性，是以理服人的。黃維樑對余光中的思想情感與生活道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解釋顯得準確、可信。大量的材料證明：余光中雖然也迷戀過西方，但他後來浪子回頭。他是位典型的愛國主義詩人。把他打成出賣靈魂的假洋鬼子，是不符合他的思想實際和創作實踐的。

四是為“余學”的建立作了最大的努力。詩人戴天看了黃維樑編著的《火浴的鳳凰》之後，創了“余學”^⑤一詞。黃維樑對余光中作品的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無疑為“余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在1991年7月廣東中山市舉行的第五屆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黃維樑作了〈余光中研究近況〉的學術報告。他綜述了台灣、香港、大陸及海外研究余光中的情況，並對余光中研究的深化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遺憾的是此報告未能形成文字，發言提綱有堆砌資料的現象，給人以倉促成篇之感。如能進一步修訂充實，一定會使“余學”的建立發生重要的影響。

黃維樑的余光中研究，不以系統性著稱，而以賞析單篇和論文引起文壇矚目。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在追蹤余光中，在各種不同場合宣傳余光中，在自己各種專著中不時舉余氏作品為說明範例，並稱余光中為“一代宗師”和“語言大師”，這引起不少人的共鳴，也招來一些人的反感和嘲諷。余光中的藝術成就到底應如何評價，他在台灣乃至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應佔甚麼地位，這本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黃維樑的研究自然不是定論，有些論述也許還有欠科學之處，但黃維樑對余光中的研究和他對香港文學的研究一樣，填補了不少空白，其拓荒之功是不可沒的。

註釋

- ① 參看徐永齡：〈論黃維樑的文學批評方法和評論風格〉，《四海》（北京），1993年1月，頁123—130；徐永齡：〈黃維樑的文學批評標準——評〈香港文學初探〉〉，《文匯報》（香港），1992年9月20、27日；王一桃：〈淺談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文匯報》（香港），1989年8月13日；王一桃：〈文章得失寸心知——評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文匯報》（香港），1990年2月4日、11日。

- ② 參看李華川：〈小評《香港文學初探》〉，《讀者良友》（香港）3卷1期，1985年7月；賈然：〈不宜推銷“通俗文學”〉，《讀者良友》3卷3期，1985年9月；崢嶸：〈小小意見〉，《讀者良友》3卷3期；葉輝：〈導遊式批評——略談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讀書人》（香港）第4期，1987年8月；黃維樑：〈關於《香港文學初探》〉，《讀書人》第5期，1987年9—10月；葉輝：〈再談導遊式、印象式批評——關於《香港文學初探》〉，《讀書人》第6期，1987年10—11月；馮偉才、梁秉鈞等：〈評論香港文學的態度與角度〉（座談會），《讀書人》第6期，1987年10—11月。
- ③ 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北京：中國友誼，1987年12月，頁15。
- ④ 同上，頁264、265、269。
- ⑤ 葉輝：〈再談導遊式、印象式批評〉，《讀書人》第6期，1987年10—11月，頁19。
- ⑥ 葉輝：〈導遊式批評〉，《讀書人》第4期，1987年8月，頁27。
- ⑦ 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頁19—20。
- ⑧ 同上，頁20。
- ⑨ 李華川：〈小評《香港文學初探》〉，《讀者良友》3卷1期，1985年7月，頁91。
- ⑩ 同上。
- ⑪ 武漢出版社，1982年。
- ⑫ 轉引自夏志清：〈中國詩學縱橫論·序〉，《中國詩學縱橫論》，台北：洪範，1977年12月，頁1。
- ⑬ 梁錫華：〈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料一則〉〔續〕，《大公報·文學》（香港）第72期，1993年11月10日，第23版。
- ⑭ 黃維樑：〈揭開朦朧詩的面紗〉，《藍星》（台北）第23號，1990年4月，頁47。
- ⑮ 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頁130。
- ⑯ 李華川：〈小評《香港文學初探》〉，《讀者良友》3卷1期，頁90。
- ⑰ 《自由中國》（台北）6卷8期，1952年4月16日。
- ⑱ 黃維樑：《火浴的鳳凰》，台北：純文學，1986年12月，頁21。
- ⑲ 《純文學》（台北）第41期，1970年5月。
- ⑳ 《龍族》（台北）第6期，1972年5月5日。
- ㉑ 《抖擻》（香港）第2期，1974年3月。另見《蕉風》月刊（馬來西亞）第268期，1975年6月。
- ㉒ 黃維樑，《火浴的鳳凰》，頁14。
- ㉓ 《中國學生週報》（香港），1968年12月27日至1969年3月7日。
- ㉔ 《當代文藝》（香港），1976年2月號。另見《蕉風》月刊，1976年2月號。
- ㉕ 《明報月刊》（香港）第136期，1977年4月。另見《聯合報》副刊（台北），1977年8月8日。

- ②⑥ 黃維樑：《怎樣讀新詩》，香港：學津書店，1982年2月，頁168—171。
- ②⑦ 同上，頁172—177。
- ②⑧ 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頁57—67。
- ②⑨ 同上，頁69—71。
- ③⑩ 同上，頁145—156。
- ③① 《新晚報》（香港），1993年5月23日。
- ③② 潘凱雄、蔣原倫、賀紹俊：《文學批評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12月，頁173。
- ③③ 《中國學生周報》，1968年12月27日至1969年3月7日。筆名為“游之夏”。
- ③④ 《中外文學》（台北）第14卷6期，1985年11月。
- ③⑤ 《文學世界》（香港）第5期，1989年4月8日。
- ③⑥ 黃維樑：《火浴的鳳凰》，頁1—25。
- ③⑦ 1991年。出處待查。
- ③⑧ 黃維樑，〈火浴的鳳凰〉，頁290—291。
- ③⑨ 黃維樑，〈采筆干氣象〉，《中外文學》，1985年11月號。
- ④⑩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鼓應於1977年12月曾寫過一本《這樣的詩人余光中》，內容有〈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等“火藥味”甚濃的文章。此書於1989年9月由台笠出版社出增訂本，加收了郭楓、曾心儀、李勤岸、莊金國、黃樹根等人激烈批評余光中的文章。
- ④⑪ 該書資料截至1979年初。1979—1985年間的資料，黃氏與王良和曾在《香港文藝》（香港：香港青年作者協會）第6期（1985年）合編了〈余光中研究資料續編〉。
- ④⑫ 參看柯慶明：《現代文學批評述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10月，頁3—168。原文發表出處待查。
- ④⑬ 參看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頁280—286。
- ④⑭ 黃維樑：《火浴的鳳凰》，頁16。
- ④⑮ 《中華雜誌》（台北），第173期，1977年12月。
- ④⑯ 黃維樑：〈重讀〈敲打樂〉〉，《大姆指》（香港），1978年4月16日。另見《聯合報》副刊，1978年6月15、16日。
- ④⑰ 轉引自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頁307。

1993年11月30日於武昌紫陽湖

作者任職於武漢中南財經大學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所。